

读报运动：中央苏区群众宣传动员的勃兴

邱 明

【摘 要】读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党员群众开展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与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集体性学习活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扩大党报党刊影响力，中央苏区大力推广和普及读报运动，读报区域从城市走向广袤农村，读报对象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尤其是党报党刊发挥了主体作用，推进了运动的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读报运动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动员支持革命战争、促进苏区政权建设、提高群众文化程度、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当今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群众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作者简介】邱明，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院刊编辑室副教授，主任记者（江西 井冈山 343600）。

【原文出处】《苏区研究》（南昌），2022.6.64～7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央苏区党报党刊研究”（21XDJ02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①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创新传播方式、宣传党的理论进行了不懈探索，其中读报运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读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党员群众开展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与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集体性学习活动。读报运动萌芽于建党初期，推广和普及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一直延续到长征路上，并盛行于延安时期。在中央苏区时期，读报运动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达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扩大党报党刊影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学界对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的研究关注较少，相对中央苏区其他运动史的研究而言，成果还非常有限。目前主要有三部通史类专著的一小部分章节和段落谈到了中央苏区读报运动^②；学术论文也较少，中国知网检索有关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的研究成果目前只有5

篇。现有成果主要从以下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一是从史料的梳理出发，对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③。二是结合思想史和阅读史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以开辟广泛的阅读空间和组织集体读报的方式，建构公共阅读，开辟政治传播渠道，逐步形成“群众办报”的思想^④。三是从新闻传播史的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组织读报团、开展“读报用报”运动，积极扩大报刊在基层官兵中的宣传效果。^⑤已有成果对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总的来看，目前关于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的研究仍属于初步探讨阶段，对这一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本文从读报运动与中央苏区群众宣传动员的视角，研究和考察中央苏区读报运动为什么开展、如何开展、对群众宣传动员产生什么影响，并分析读报运动对当今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的现实启示。

一、读报运动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这里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农耕为主,生活贫瘠,经济社会极为落后,老百姓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设苏维埃政权,首先迫切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帮助群众读懂革命的目的和方式。因此,利用党报党刊进行宣传教育,在群众中开展读报运动是其重要的简便易行方法。读报运动不仅成为党联系苏区群众的一个很好的纽带,而且成为党领导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战斗号角。具体来说,开展读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和扩大党报党刊影响力。

(一)读报运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报纸是有阶级性的,必须站稳阶级立场、维护阶级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主办的报纸,必须为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服务。关于党报的使命和功能,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辩护发言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⑥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使命和功能是无产阶级的“耳目”和“喉舌”。关于党报的任务,恩格斯指出:“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⑦无产阶级政党报纸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阐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敌对阶级的谬论。关于指导党报的方针和理论,列宁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通过党的宣传工作传导到各级党组织,党员的革命行动才能有

准绳。无产阶级政党报纸就是这种理论传播的载体。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利用党报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3年,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指出,要“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工作”^⑨,指导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党内教育的问题,提出利用“党报”,开展“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及“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⑩等活动,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1933年9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在文化教育的战线上,我们同样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的动员。我们要以思想的武装,武装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去战胜帝国主义与国民党。”^⑪读报运动就是利用党报这个平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思想武装党员群众的一个有效抓手。

(二)读报运动是传播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有效载体

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可以通过读报运动进行有效传播,从而集中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党报的作用在于阐明党的纲领与政治路线,聚集广泛的同一政治主张、拥护同一政治路线的份子,团结成为统一的党,以整齐的阵线和步伐,开展行动一致的革命斗争。读报运动是形成这种统一意志和行动的有效载体。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⑫。1930年5月10日,《红旗》刊发社论《党员对党报的责任》指出:“读党报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同时也是每个党员的义务。每个党员如何在群众中起先锋队的作用,如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如何教育自己以及群众等等,都需要从读党报上去学习……党报便是党的活动的指针。”^⑬并且,党报文章对中央下发的文件通告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中央下发的文件通告带有理论性、

原则性和指导性,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某项具体工作作出详细部署。而党报的文章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阐释和解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带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开展读报运动,可以让基层党员和苏区军民广泛深入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形成思想和行动上下一致的战斗整体。

(三)读报运动是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

读报运动是密切联系群众、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党报的决议》中指出:“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办报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党报与群众工作关系,即党报是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扩大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武器。读报运动是党和广大群众直接对话的工具,在党的群众工作中能够发挥一系列作用。一是读报运动可以使党的影响更广泛深入群众,使党当前的政治口号在群众中得到普遍了解与传播,不断提高群众觉悟,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二是读报运动可以提高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摆脱文盲半文盲“睁眼瞎”的悲惨命运。三是群众可以通过读报运动向党组织反映社情民意,解决实际困难。四是读报运动可以将群众组织起来,吸收有阶级觉悟的群众入党,吸收广大革命群众加入赤色工会及其他各种革命团体。五是读报运动是党训练革命干部,特别是训练宣传干部有效方法之一,可以不断提高宣传队员对群众说话的技能,学习群众工作的艺术,培养党与群众团体的革命干部。

(四)读报运动对扩大党报党刊影响力有特殊作用

在建党初期,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办报经验不足,受民族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影响,当时党内基本上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同人办报”的模式,即办报基本上是由几位编辑操办,执行一种精英办报的理念。这种模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启民智、

传播先进思想、鼓动工人运动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但是随着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地展开,“同人办报”的模式受精英主义所限,躲在小房间里办报,较少接触革命群众,不太接地气,带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意味,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在办报实践中开始应运而生。1930年5月10日,李立三提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⑤,这是“全党办报”的最初萌芽,即党报不仅是几位编辑记者的事,而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每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要积极参与到办报工作中。出于读报在办报中特殊作用的考虑,李立三将“读党报”列为每个党组织及党员对党报工作的三大任务之首,他指出:“读党报,发行党报,替党报做文章,通信,参加一切党报工作,这是每个党员必须尽的义务!”^⑥中共领导人意识到,不仅普通党员要读报,而且领导干部要带头读报,用读报和写文章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方式。1931年2月21日,张闻天将读报作为领导干部总结和传播工作经验的重要职责:“党的工作的负责者经常阅读党报,经常为党报供给文章,是他的实际工作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他必须尽的责任。”^⑦

“群众办报”是对“全党办报”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为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党报党刊必须树立受众意识,形成全党上下共同办报的合力,让传播尽可能地被读者接受。根据当时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没有能力独立阅读报纸的状况,中央苏区党报党刊迫切需要组织和引导读报运动,吸引群众参与。《青年实话》第10期刊发《本刊大刷新启事》,希望读者“更努力帮助我们。多多推销,多多组织读报班”^⑧,还在同期“轻骑队”栏目中,对乐安县委借口“本地群众文化程度太低”^⑨而拒绝推销和组织读报班的怠工行为进行了批评和揶揄。读报运动促进了党报党刊在苏区群众中迅速扎根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读报运动在苏区群众中蓬勃开展

中央苏区读报运动在区域上从城市走向广袤农

村,在对象上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尤其是党报党刊发挥了主体作用,推进读报运动走向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一)读报运动从城市走向广袤农村,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读报运动,萌芽产生于建党初期,主要在城市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集中开展。1922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择《前锋》或《向导》论文做材料,开展政治讨论。^③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和小组发出通知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各地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④。这实际上是读报运动的萌芽,参与读报的成员基本上是党内同志。当时很多党内文件是通过刊发在党报党刊来下发的,党内开展读报活动,实际上是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的过程。比如1931年3月,为纠正“立三路线”影响,江苏省委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规定“阅读党报是每个同志对党起码应负的责任,并应在支部中,群众中,发展读报小组的组织”^⑤。随着党组织力量壮大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读报运动向工人群众拓展。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设立工人学校读书班等以接近影响工人群众”^⑥。根据工人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各地党组织通过开展读报、识字运动、补习等活动,以满足工人群众的文化教育需求,并在其中施加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让工人群众接受党的领导。

随着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共产党办报理念逐渐由“同人办报”走向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受此影响,读报运动从城市走向广袤农村,从党内走向各行各业的基层群众。具体来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始阶段。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组织推广了读报运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⑦。毛泽东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办报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了“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等一系列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从创办各种简易刊物、成立宣传队起步,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传播手段,如标语、歌谣、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方式,来发动群众读报。^⑧在毛泽东等大力推动下,红军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起了读报小组,读报成为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

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1930年2月至1931年1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红军各基层单位创办《时事简报》,号召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都参与读报。1930年3月,红四军攻占大余县城,曾经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张贴了一张《时事简报》,引来过往群众纷纷来读,“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⑨。为了推广这一经验和做法,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专门发出通令,要求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读报运动。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网,制定各地同志负责通信,写文章督促发行,及建立工农,通讯员及读报班。由党报委员会起草详细计划。”^⑪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要求各地举办“读报班”,并开始重视发挥工农通讯员的作用。1931年7月1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青年实话》创刊号上号召团员青年正式开展“读报运动”^⑫。这是中央苏区首次将读报从“活动”上升到“运动”的层面,标志着读报运动全面铺开。

第三阶段是高潮阶段。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创办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等新闻媒体,在此前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党报党刊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苏区的报刊就达203种,中央苏区四大报刊最

高发行数量达到12万余份。^⑧这为大规模开展读报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对开展读报等运动来提高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做出了规定:“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提出问题讨论。”^⑨决议案要求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在读报运动中进行理论指导和释疑解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推动下,读报运动覆盖面迅速扩大到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的各个层面,各地普遍建立起了读报组、识字班,设立了列宁室俱乐部,建立了读报规章制度,开展读报竞赛等。比如,根据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记述,长冈乡当地夜学甲班的教材是“读报”^⑩;上才溪的读报团“设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天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下才溪的读报团有“一处,也是五天逢圩日一次。”^⑪1934年1月,“二苏大”召开期间,读报运动成为代表团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代表团每个伙食单位都组织了列宁室,开展识字读报、政治讨论会、卫生运动等工作。^⑫来自白区的代表也参与到读报运动中,开展识字读报演讲、墙报布置等活动。^⑬1934年8月,反帝拥苏同盟举行反帝宣传展览会,读报和墙报成为重要的表演和展览内容。^⑭

中央苏区的读报运动辐射带动到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比如,闽浙赣苏区专门成立了读报委员会,制定了《指导群众读报条例》,加强对群众读报的指导工作。^⑮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社会文化科,专门负责读报班、识字班等社会文化事业。^⑯这个苏区的青年妇女在读报班中研究种种问题,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青年妇女。^⑰湘鄂西省委提出,省苏今后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国内日报的领导,建立各地国内通信员和读报小组”^⑱。川陕苏区成立了工农读报社,学习各类报纸、文件上百种,还把宣传品雇石工刻在石头上,宣传党的主张。^⑲

第四阶段是延续阶段。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一

方面,留守的南方游击队坚持斗争,瞿秋白等坚持办《红色中华》报,继续开展读报和发行工作,给敌人造成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尚未转移的假象。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在长征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红星》报,一有闲暇就组织红军战士读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鼓舞红军斗志。直到长征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延续在中央苏区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在延安时期掀起了更大的读报运动热潮。

(二)党报党刊发挥了读报运动的主体作用

在读报运动中,中央苏区各大党报党刊主动发挥组织领导的主体作用,引导群众热情参与。

一是组织领导各地开展读报运动。各大党报党刊明确政治任务,做到读报运动有专人负责。1931年7月1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1期创刊号发表李卓然的《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就苏区各级党委专人负责党报工作任务做了部署。文章指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②各大党报党刊转变领导方式,发挥了读报运动的领导作用。顾作霖在《青年实话》第1期发表的《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中认为,原先团主要的领导方式是发通告,而通告冗长空洞、千篇一律,缺乏具体性;现在要转变团的领导方式,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每个团员要把读团报当作他经常的责任,而了解不读报是一种恶劣的怠工行为。一般同志要在青年群众中提倡读报运动,用种种方法如组织读报班,读报会,图书室等来读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的报纸。”^③各大党报党刊鼓励各地建立专门机构和场所,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读报运动。1933年8月10日,李富春在《红色中华》第100期上撰文《“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指出:“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学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主要内容。”^④他号召党、苏维埃及群众团体在读报运动中,应当根据《红色中华》所提出的任务、工作经验和方法及国际国内政治消息,进行讨论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积极性。

二是制定引导读报运动的计划。中央苏区各大

党报党刊均制定了相关的计划。1933年2月29日,《青年实话》编委会发表《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号召各级青少年组织“发展读报运动,特别是在少先队团的大队中,要指定同志写读,各学校可以选作课本用,各级团部及其他青年团体,组织读报组。”^⑧这里提到读报运动把报刊直接作为课本使用,显然可以扩大报纸的作用和传播范围。1933年3月5日,张爱萍在《纪念马克思,拥护青年实话》一文中,对列宁室开展读报运动的计划安排提出了意见:“由于苏区工农青年的文化水平,一般的还很低,必须发展读报运动。在俱乐部中,列宁室普遍组织读报组,特别是在团内,少先队内,儿童团内及其它青年群众团体内,必须指定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负责读报工作。只要青年实话一到,立即召集读报组会议,宣读、解释与讨论青年实话中的一些重要文章。”^⑨少共苏区中央局在1933年6月21日发出通知,责成各级团组织必须在团内、少先队内、儿童团内、俱乐部内组织朗读班,朗读《青年实话》给不识字的人听,各级团宣传部做出具体计划。从1933年5月至10月,《红星》报先后四期连载《读报工作》系列文章,阐述了读报的重要性以及读报的方式。

三是发挥通讯员网络的作用。通讯员是读报运动的各个神经元,可以构建起党报党刊与广大群众紧密联系的网络。各大党报党刊建立通讯员网络,发展读报小组。1933年2月4日,中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局在《红色中华》报第49期联合发布《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对办报思路与定位进行重大调整,要求建立良好的通讯网与发行网,责成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个同志为通讯员,其中规定通讯员的第五项任务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⑩。密切与读者的关系,是通讯员网络的重要任务。1933年2月26日,《青年实话》编委会发布《本刊通讯员条例》,就通讯员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指出:“通讯员要经常接近读者,探求读者对本刊的批评、意见并在读者中发展读报运动,和推广本刊分销与发

行。”^⑪各大党报党刊指导和督促通讯员工作,发挥通讯员网络作用。《红星报》开辟“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1934年8月1日,《红星报》编委发表《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对以往通讯员在发行、读报、反馈群众意见方面工作不力进行批评,要求每个通讯员要“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读报的责任,随时将群众对本报的意见告知我们”^⑫。通讯员直接面对群众,在读报中将党报党刊的消息传递给广大群众,推进发行工作,又在读报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将之反馈给报社,发挥了党报党刊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读报运动走向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经过探索和推动,读报运动逐步从散、小、弱走向了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第一,建立读报场所俱乐部列宁室。各级苏维埃政府抓紧建立乡村俱乐部列宁室的工作。据江西省内14个县的统计,至1932年底一共建建立乡村俱乐部列宁室712个。^⑬中央苏区各个机关单位和红军部队内也都有俱乐部列宁室。按照要求,列宁室备有书报,供人阅读。列宁室的功能是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出墙报和读报是其中的重要活动。列宁室制定了专门的读报工作计划,不断创新方法,提高了群众参与读报的积极性。各种小组长在群众中经常进行宣传引导,吸引群众来到列宁室看书报、研究问题、参加工作。1931年12月25日,《红星》报刊载《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指出:“列宁室的墙报要经常出版,墙报的内容和技术要经常有计划的改善,墙报内容最后能够适合于下层士兵群众的需要,读报班、识字班、讲演会,要经常的举行。”^⑭列宁室内组织各种研究组,比如苏联研究组、帝国主义研究组、地理研究组、群众工作研究组等等,发动群众加入各组学习讨论,接受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

第二,规定读报的主要内容。读报主要读墙报和党报党刊,不同人群所读的党报党刊各有侧重。其中,《斗争》是各级党组织的必读刊物,《红色中华》是广大群众的普读刊物,红军战士必读《红星》报,青

年团员和儿童团必读《青年实话》，工人群众必读《苏区工人》，以及各省县苏维埃、各军团军政治部、各行业办的机关报分别被相应群体列为读报内容。比如，兴国高圩黄岑乡模范支部在全乡组织了5组读报班，“经常读红色中华，由群众自己出钱买报读”^⑤。汀东新桥区模范营建立了列宁室，每次下操之后开展读报，短期内开展了两次，到了40多人，内容读的是“红星报‘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和红色战线”^⑥。读报并不是死板的把报上所有消息文字全部念一遍，而是选择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及要点说出来。领读员事先将报纸全看一遍，将要读的几篇留下记号，熟记其中要点，读时进行解说，需要用图表的则把地图挂起来，使听者更易了解。例如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包括白区和苏区)革命斗争发展消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形、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残酷行为、共产党青年团的各种消息、苏维埃的各种政策法规，尤其注意读对白区的反帝斗争、苏区群众参战的热忱以及扩大红军情形等。读的文章，既有重要的新闻、电文，又有一两篇论文，还会读诗歌和故事、解释说明插图含义。

第三，明确读报的方式方法。一是组织分班。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分成不同的读报班，每个读报班人数控制在1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20人，读报时间一般在农闲时节和夜校活动，由墙报委员、通讯员或者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领读员，带领全班读。二是组织买报。每班或两班联合起来每人出铜元数枚或十余枚，定阅各种党报党刊若干期、若干份，选定一人专门负责每期取报及计划读报。三是组织讨论。每次读完报之后，在领读员的指导下，读报班进行简短的讨论会，讨论哪篇文章是对的，哪篇文章是错的，对本期中心问题发表意见。四是开展读报竞赛。各个读报班对读报的次数、人数、订购报纸份数等进行比赛，将竞赛评判结果在墙报上登载，鼓励先进，鞭策落后。比如，有的红军战士开展“青年实话，火线，红星报的读报测验，要在八十分以上。”^⑦江西各县工联将文化教育竞赛总结刊登在《苏区工人》上，详细公布各县在读报班、识字班、墙报和投稿的

数据。^⑧五是写信交流。群众读报之后，有的将读报体会，写信告诉前线的红军战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有的向党报党刊投稿，抒发对苏区生活的热爱和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热情。总之，整个读报的过程简短、轻松、活泼、自然，并能互相交换意见。

第四，讲究读报的技巧。一是注重读报方法的灵活性。红军在行军打仗时不能在列宁室读报，则采用飞行阅读的方式，利用中途休息时间随时随地开展读报、识字、唱歌、猜谜、讲革命故事等，使战士们不感到疲劳。^⑨二是注重读报方法的形象性。比如在俱乐部列宁室挂一幅《红色中华》报刊载的地图“国民党公开出卖了半个中国”^⑩，吸引群众来看地图和听时事报告，每天的时事报告可以面对地图不断增加对消息的阐释，这种“把时事报告像说故事一样的说出来”^⑪，受到群众的欢迎。三是注重读报方法的趣味性。比如《红色中华》报刊登了通讯《两支山歌煽动全屋——一个宣传队员的笔记》，介绍列宁师范学校组织六个宣传小队到叶坪洋溪村六个夜校开展宣传活动的事迹。宣传员在夜校里“很活泼地唱起山歌来，没有唱到几支，就全屋子的群众都挤到夜校里来听山歌了。郭人凤、肖春生等几个宣传员，看见人数已经到了很多，就进行宣传，宣传员讲话也很通俗，所以讲话完了要回时，群众还没有走散……不但建立了夜校的宣传队，还发动了群众订立做草鞋、竹碗等慰劳品”。文章号召“出发到地方上负责宣传的同志们，这种办法是值得大家择取的”。^⑫四是注重读报方法的多样性。《红色中华》报不定期开设了《宣传方法介绍专栏》，以期推动读报运动。比如《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介绍了讲报的做法和经验，先由教员向3至5名听报员讲报，再由听报员分别到群众中去讲报，读报受众面迅速扩大到二三百人。文章号召各地学习官山乡的读报经验，提出：“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呵，每个乡都应该建立这一工作呵！”^⑬

三、读报运动对苏区群众宣传动员工作的影响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处在四周白色势力重重包围之中。读报运动是在这种极其险恶简陋的条件下，

开展的简便易行的宣传传播方式。它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动员支持革命战争、促进苏区政权建设、提高群众文化程度、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凝聚人心,提升群众政治觉悟

读报运动是一种校外的政治理论学习课,在提高政治水平、发扬革命斗争热忱、坚定革命必胜信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行各业的党员群众积极购买党报党刊,在列宁室成立读报组,工作人员组织政治讨论会,讨论党及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的决议与策略路线,使政治水平较低的同志对政治形势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央苏区各大党报党刊均有大量读报运动的报道。《红星》报报道了读报运动对红军战士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如,红军某团在“创造铁的红军”政治训练中,“战斗员对于墙报非常热心,平均每三天能出版一次,投稿人数达八十多名至少也有五六十人,这一团对于墙报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而且喜欢读报,喜欢上政治课”^①。在东方战线夺取连城的战斗中,“待机作战的〇〇部队进行了最充分的政治工作,有唱歌的,喊口号的,讲笑话的,读报的,在不激烈的疏疏密密的枪声中错杂着,我们红军战斗的歌声,笑声与口号声,在这里令人感到无限的热烈与兴奋激昂!”^②在红校野营演习休息时,“各班能够自动提出问题讨论或读报讲故事,虽然在上山下岭,仍是雄赳赳的迈步前进,政治情绪始终是紧张的热烈的。”^③这些报道鲜活地描述了红军战士高昂士气和英勇行动。显然,形成这种精神状态的背后,开展包括读报运动在内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红色中华》报集中报道了各地群众拥护党、苏维埃和红军的状况,反映出读报运动在群众工作中取得成效。一方面群众支持革命的热情高涨。比如在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瑞金苏区干部深入群众,利用标语口号、读报组、儿童团作广泛的宣传,说服个别的落后份子,“这种通俗的解释和热情的鼓动,使广大群众感动起来,兴奋起来”^④,纷纷上前线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斗。另一方面群众参与苏维埃的主动性增强。比如在选举运动中,邓坊区邓坊乡“选举委员会每村组织了读报班宣传队,训练班通讯员等,有计划的热烈的在进行工作”^⑤,使一个选举运动落后乡变成了模范乡。宁化淮阳区淮阳乡第一所列宁小学校是一个模范学校,敢于做思想斗争,经常开读报会、做墙报,“如有某一学生不好,立即向他斗争,并做墙报来反对他。”^⑥

《青年实话》针对部分团员青年不爱读报的现象进行了剖析。1932年8月,刘志坚在《怎样克服红军中团员不读青年实话的坏现象》中指出,团员不看团报,便不能了解团内生活、策略、路线、工作方法、工作思想、行动,便不能得着正确的领导,求得更大的进步,这是一个坏现象,必须立即克服。文章对报纸的内容、阅读、发行提出建议,其中“读报班的工作,必须真正的建立和健全起来,由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来有组织的领导文化低的团员阅读,把青年实话的内容,解释给他们听,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团员了解青年实话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看报的兴趣。”^⑦《青年实话》为此编发了“编者按”,表示接受这些意见并加以改进。果然不久,读报工作有明显改进。在红军中,团组织以游戏、唱歌、读报、讲革命故事、猜谜、竞赛等方式,教育青年,要求“青年实话报,必须成为青年群众普遍的读物,发动以团员为中心的广大的读报运动,以及向青年实话踊跃投稿”^⑧。在工厂里,团组织加强了对团员和青工学徒的政治文化教育,“建立了读报室识字班、读报组,指定专人负责,事前编好课程,准备材料,有一定时间去轮流上课。”^⑨读报运动极大地丰富了青年业余生活,受到青年欢迎。有位印刷厂青工张一台欣喜地写信告诉火线的哥哥张一昌:“我天天都有新的报纸杂志啦,比较重要的就有读报班的同志讲给我们听”“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⑩。

(二)鼓舞士气,动员支持革命战争

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全力打赢反“围剿”战争,是中央苏区最重要最紧迫的中心工作。读报运动在联系前线后方、增进阶级友爱、开展士兵运动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读报运动架起了前线与后方沟通的桥梁。红军与群众通过读报来互相鼓励,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抗强敌。在前方,红军战士个个都很高兴的读报、唱歌、呼口号、讲故事,“活泼的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大家等待着上级的命令,准备冲锋杀敌。”^①在后方,每到《红色中华》出版那一天,红军家属就会参加夜校组织的读报课,大家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各地动员情形,“每当读到红军在前方不断的击溃白匪,缴获大批自动步枪,机关枪,和各地妇女节省粮食,参加生产等消息,他们总要兴奋得跳起来。”^②同时,各乡列宁小学的教员将文化较高的儿童、青年、妇女组织写信队,保障每月每家红属给前方一封信。教员还在夜校及识字班教写信法及读报,由区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随时督促和考察。^③有的群众写了歌颂战士的山歌,刊登在《红星》报上,给战士以极大的鼓舞。为此,红军一团一师政治部彭加仑特意创作了长达13节的客家山歌,作为前方战士给后方群众的回赠。彭加仑还致信《红星》编委,称赞《红星》报是“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中一枝有力喇叭”,战士们在火线上时刻盼望着《红星》报速来,“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④。山歌和致信充分表达了红军将士对老百姓的鱼水之情和对党报党刊的欢迎程度。

读报运动增进了战士的阶级友爱。读报是一个集体性学习活动,能够让个体在一种轻松和睦的氛围中,迅速地融入革命斗争大家庭。各级政治部门发动党团员和老战士,吸收新战士来参加列宁室工作,帮助他们学习政治军事,读报、唱歌给他们听,细心地告诉新战士如何使用武器,用各种活泼的方式进行教育,增强阶级认同感,从而形成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比如,曾经有新战士千里行军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逃亡和掉队,原因之一就是“加紧了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利用一切空隙休息时间进行读报,开讨论会,唱歌,做游艺,保证了战斗员的战斗情绪。”^⑤在运送伤病员过程中,政治工作人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来进行讲故事,说笑话,读报,报告红军胜利

消息等”^⑥,尽可能地减少伤病员的疲劳和痛苦,使伤病员安适愉快地到达目的地。

读报运动帮助改造白军俘虏。红军在白军俘虏中开展兵运工作,用读报、抗日讨蒋大会、同乐会、政治问答晚会、班排讨论会、政治课等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号召他们加入抗日讨蒋同盟,加入抗日讨蒋的先锋队——红军,为革命武装增加生力军。据《红色中华》报道,有一次“七天内动员了一千一百八十一名士兵加入红军(占全数俘虏百分之九十)”^⑦。

(三)动员力量,促进苏区政权建设

党报党刊是苏区人民用以巩固与扩大工农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战争的锐利武器,读报运动则是使用好这个武器的重要抓手。读报运动鼓舞了民心,激发了斗志,引导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

比如在经济战线动员方面,党员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有的单位把伙食尾子节省下来购买公债券,争当“光荣的模范”^⑧。《红星》报第51期发出征集大批军毯军衣的号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列宁室读报讨论时认为:“我自己少穿一件衣,少盖一床毯子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军衣军毯送给新战士去!”^⑨大家纷纷主动捐助。

比如在拥军优属方面,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发出通电,提出做个真正的模范苏维埃公民的七个条件,条件之一就是“红军家属都应当加入消灭文盲协会,就是进夜校,进识字班,学习识字读报,写信,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色中华”^⑩。红军家属的通电激励了战士们。国家政治保卫队训练班读了《红星》报57期“抗日先遣队进福州”和“瑞金红属代表大会给红军电”以后,大家极为兴奋,一致决定:“一、写信回家里学习瑞金红属的模范,做到苏维埃模范公民的七个条件。二、六十万担的秋收借谷运动,要家里打先锋,起领导。三、要家里今年缴纳土地税。四、要老婆或母亲做两双草鞋来慰劳红军,响应二十万双草鞋的号召。”^⑪

(四)扫盲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程度

读报运动与扫盲、识字、夜校相结合,极大提高

了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学习积极性,成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一大创举。

根据当时国民党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国儿童失学率约为82%;根据1932年苏区少先队国际青年节检阅时的测验,选手中有80%是文盲。^⑤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是工人和农民自己的政府。工人和农民要想真正提高文化,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可能享受一切文化教育的权利。1933年9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教育,如消灭文盲(就是使不识字的工农分子,能看普通的书报与文件,能写普通的信件,单单识一二百字或能够识自己的名字不算消灭了文盲),俱乐部,夜学等工作,必须尽量经过社会团体与群众的协助与努力。”^⑥读报运动就属于这种社会团体扫盲力量之一。中央苏区厉行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开设补习学校、夜校、半日学校等,还利用俱乐部、列宁室、读报室、巡回图书馆、研究会等,来进行扫盲运动。识字班是读报运动中常见的组织,《红色中华》报经常被识字班列为教学材料。这种识字的过程可谓一举两得,群众既可以学文字使用和表达技巧,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时局信息。大批苏区群众因此摘掉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许多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凯丰在全苏区教育大会召开前说:“我们成功的进行了提高文化的工作,我们的劳动小学有三千多所,比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是增加了,我们还有许多俱乐部列宁室读书班,夜学等等。入学的儿童还是在继续的增加,消灭文盲运动正在普遍的进行”^⑦。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统计,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三省苏区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江西省儿童局为了庆祝江西两个半月增加30672名到校学生,专门写信告知前线红军战士“识字读报”的生活状况。^⑧与国民党统治时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文化教育的成绩是重大而显著的。

此外,党报党刊结合春耕生产、植树运动、卫生防疫、节省运动等各项工作,刊登了大量科学技术方

面的文章。群众通过读报运动,不仅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树立了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意识。

(五)推进报刊发行,发展党的新闻事业

读报运动与报刊发行相结合,是中央苏区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个特色做法。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重视加强对群众读报运动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报刊发行工作,使党报党刊及时地送到群众中去。比如在1932年7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三号命令,为了推广各类新闻报纸,发动群众普遍读报,决定新闻纸寄费减价。^⑨中央苏区党报党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发行数量随之迅速上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

中央苏区党报党刊在读报运动中表现得非常主动与活跃,彰显出工农民主政权下党的新闻事业无限的活力与张力。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的提高了。”^⑩

结语

几乎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推广普及读报运动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杭州、宁波等地曾经在1929年试图推广“民众阅报运动”^⑪,国民党中央党部“文胆”陈布雷亲自莅临启动大会并做演讲。但“民众阅报运动”浮于表面,没有深入群众,没有关切群众利益,没有组织发动群众,没有使用群众语言,没能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最终无果而终。

与“民众阅报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苏区读报运动。该运动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入革命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以自己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戴。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央苏区读报运动存在一些

形式主义倾向,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运动式。但总体来说,中央苏区读报运动成功地宣传了党主张、宗旨、政策,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罪恶及旧政权旧制度的腐朽没落,批判了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革除了落后的封建恶习,有力地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总结分析中央苏区读报运动的成功经验,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党的意识形态主动权和领导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当前尤其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二是要聚焦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凝聚全社会力量作为构建、完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目标,阐释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奋斗目标、战略部署,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鼓劲加油、凝神聚力。三是要坚持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的疾苦,对群众迫切需要的问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走、转、改”中不断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让党报党刊真正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四是要体现时代特色,增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大众性,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努力用时代化、大众化话语讲好党的创新理念,不断提高宣传动员的针对性。五是要加强方式方法创新,不断拓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传播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网络的宣传动员作用,把线上和线下、传统与现代、显性与隐性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注释:

①习近平:《自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2018年8月21日),《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0页。

②这3部专著分别是程云:《江西苏区新闻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7页;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9页;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462页。

③这方面成果包括:上述的3部专著;管西荣:《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活动》,《百年潮》2020年第4期,第73-78页。

④这方面成果包括:林绪武、管西荣:《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以〈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为例》,《人文杂志》2021年第2期,第103-112页;李丹、周宇豪、张睿:《集体读报:中央苏区农民群众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与呈现方式》,《未来传播》2022年第1期,第85-94页;张睿:《“群众办报”:思想史与阅读实践中的理论建构》,西北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⑤这方面成果包括:饶勇:《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用报”运动刍议》,《中国出版》2011年第4期,第67-70页。

⑥《“新莱茵报”审判案 马克思的发言》(1849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⑦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0页。

⑧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下旬),《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19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⑩《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⑪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斗争》第26期(1933年9月15日),第11页。

⑫《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0-21页。

⑬《党员对党报的责任》(1930年5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32-133页。

⑭《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1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71页。

⑮李立三:《党报》(1930年5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27页。

①李立三:《党报》(1930年5月1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27页。

②思美(张闻天):《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1931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41页。

③《本刊大刷新启事》,《青年实话》第1卷第10期(1932年2月15日),第2页。

④《文化程度最高的县委》,《青年实话》第1卷第10期(1932年2月15日),第16页。

⑤《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4页。

⑥《钟英(即中央)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页。

⑦《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78页。

⑧《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56页。

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6页。

⑩邱明:《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工作探析》,《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6期,第89-99页。

⑪《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1931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1页。

⑫《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1931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9页。

⑬《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1月27日通过),《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72页。

⑭作霖:《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青年实话》第1卷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版。

⑮程云:《江西苏区新闻史》,第180页。

⑯《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1日至5日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8页。

⑰《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07页。

⑱《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1-342页。

⑲斗人:《大会代表生活断片》,《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4期(1934年1月28日),第3版。

⑳《战争动员中的代表生活 白区代表的生活片断》,《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6期(1934年2月1日),第3版。

㉑乾:《反帝宣传展览会》,《青年实话》第102期(1934年7月30日),第5版。

㉒程云:《江西苏区新闻史》,第165页。

㉓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苏维埃的建设》,《红旗周报》第27期(1931年12月27日),第78-88页。

㉔一知:《鄂豫皖苏区的青年妇女》,《青年实话》第1卷第19期(1932年6月10日),第18-21页。

㉕湘鄂西省委:《湘鄂西省苏维埃的工作》,《红旗周报》第40期(1932年5月14日),第50-66页。

㉖江鸟寄:《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的惊人的胜利》,《斗争》第66期(1934年6月30日),第18页。

㉗李卓然:《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193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47页。

㉘作霖:《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青年实话》第1卷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版。

㉙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红色中华》第100期(1933年8月10日),第3版。

㉚《青年实话》编委会:《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青年实话》第2卷第4号(1933年2月19日),第41-45页。

㉛张爱萍:《纪念马克思,拥护青年实话》,《青年实话》第2卷第6号(1933年3月5日),第9-10页。

㉜中少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红色中华》第49期(1933年2月4日),第4版。

㉝《青年实话》编委会:《本刊通讯员条例》,《青年实话》第2卷第5号(1933年2月26日),第34-36页。

㉞红星编委:《向我们的通讯员说几句话》,《红星报》第56期(1934年8月1日),第8版。

㉟程云:《江西苏区新闻史》,第163页。

㊱《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红星报》第3期(1931年12月25日),第1版。

㊲《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第15页。

㊳张海心:《汀东新桥区模范营的列宁室工作》,《红色中华》第166期(1934年3月24日),第2版。

㊴《一个青年干部同乐大会》,《青年实话》第106期(1934年8月25日),第3版。

⑤⑤《江西各县工联九十两月文化教育竞赛总结》，《苏区工人》第13期(1932年12月5日)，第6版。

⑤⑥《战时政治工作——李卓然同志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红星报》副刊第6期(1934年3月20日)，第1版。

⑤⑦《国民党公开出卖了半个中国》，《红色中华》第210期(1934年7月5日)，第1版。

⑤⑧《创造宣传鼓励的新方式 反日宣传的时事报告》，《红色中华》第214期(1934年7月14日)，第4版。

⑤⑨王昌期：《两支山歌偏动全屋——一个宣传队员的笔记》，《红色中华》第224期(1934年8月10日)，第4版。

⑥①刘伟文：《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红色中华》第216期(1934年7月19日)，第4版。

⑥②周元非：《红军生活 最有进步的三师十一团》，《红星报》第8期(1932年2月4日)，第3版。

⑥③袁国平：《东方战线通讯——夺取连城的经过》，《红星报》第3期(1933年8月19日)，第3版。

⑥④铁生：《红校野营演习中政治工作片段》，《红星报》第11期(1933年10月15日)，第3版。

⑥⑤然之：《瑞金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的宝贵经验——金维映同志的谈话》，《红色中华》第195期(1934年5月13日)，第1版。

⑥⑥马维祺：《在选举运动中 一个落后乡变为模范乡了》，《红色中华》第126期(1933年11月17日)，第3版。

⑥⑦《一个淮阳乡的模范学校》，《红色中华》第131期(1933年12月2日)，第4版。

⑥⑧刘志坚：《怎样克服红军中团员不读青年实话的坏现象》，《青年实话》第1卷第24期(1932年8月20日)，第17-19页。

⑥⑨邱织云：《红军中的青年工作 彻底转变十五军的青年工作象》，《青年实话》第1卷第25期(1932年9月10日)，第22-26页。

⑦①家承：《模范的印刷厂支部工作》，《青年实话》第3卷第23号(1934年5月13日)，第20-21页。

⑦②张明云：《印刷所的青工生活 一台写给他哥哥的信》，《青年实话》第3卷第5号(1933年12月31日)，第15-17页。

⑦③《在前线上的少共国际师》，《红星报》第20期(1933年

12月16日)，第3版。

⑦④《介绍中央劳动部的红属夜校》，《红色中华》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第3版。

⑦⑤弋丽：《拥护“八一”开幕的瑞金》，《青年实话》第102期(1934年7月30日)，第5版。

⑦⑥彭加仑：《山歌(答秋香同志)》，《红星报》第15期(1933年11月12日)，第4版。

⑦⑦《新战士千里行军没有一个逃亡和掉队，加强护送工作的成绩》，《红星报》第34期(1934年3月25日)，第4版。

⑦⑧荣：《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 方面军直属队组织政治护送队》，《红星报》第17期(1933年11月26日)，第2版。

⑦⑨伍晋南：《一千一百八十一名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245期(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⑧①荣：《方面军政治部给予党和总政治部的热烈回答》，《红星报》第10期(1933年10月8日)，第3版。

⑧②刘自升：《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捐助衣毯的动员》，《红色中华》第215期(1934年7月17日)，第3版。

⑧③《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的通电》，《红色中华》第223期(1934年8月8日)，第3版。

⑧④方强：《一个读报的成绩》，《红星报》第62期(1934年8月30日)，第4版。

⑧⑤阿伪：《论消灭文盲运动》，《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5日)，第10页。

⑧⑥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斗争》第26期(1933年9月15日)，第11页。

⑧⑦凯丰：《在全苏区教育大会的前面》，《斗争》第31期(1933年10月21日)，第1页。

⑧⑧江西省儿童局：《亲密的联系着》，《红星报》第22期(1933年12月31日)，第4版。

⑧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第三号)》，《红色中华》第28期(1932年7月21日)，第5版。

⑨①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第9版。

⑨②许高勇、林珍：《20世纪20年代阅报运动与民众的阅报意识动员》，《新闻春秋》2020年第3期，第27-33页。